

第一章 引论 中国参与世界

中国的形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每两三年就有一个变化。80年代中期，中国致力于改革很有吸引力，尤其同当时的苏联相比。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情况急转直下。此后不久，从1993到1995年，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飞速前进。而到了1996至1997年，中国又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成了美国的下一个敌人。但在最近的亚洲经济危机（1997—1998年）之后，美国人又开始把中国看作负责任的伙伴，可以同中国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稳定而合作，这是因为中国迅速积极地参与了援助泰国的一揽子计划，1998年帮助稳定了港元。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它还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企业和银行改革。

由于对中国的看法变化无常，为人称道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变幻莫测：80年代中期，同改革者进行合作；80年代后期，制裁压迫者；90年代初，从经济巨人身上获取经济利益；90年代中期，准备同新兴大国大打出手；90年代后期，同一个负责任的的中国进行合作。

如此描述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对它是小小的讽刺。它们对中国的看法不断变化，所提的对策也层出不穷。其实，每种观点背后的现实则更为复杂。十分明显，中国并

没有像美国媒体报道的那样变化无常，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更大的延续性，并没有采用权威们在录音采访和报纸专栏中所推崇的政策。

同过去的一个世纪一样，美国今天面临着相同的挑战。那就是，准确认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避免先前对华政策中忽而将其浪漫化，忽而又对其极力唾弃的做法，避免政策摇摆不定。

自中国对外开放和 70 年代初中美和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 10% 左右而居高不下。除了大跃进前后的灾难性几年（1957—1962）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1971），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已保持了 50 年。形势现在愈加明朗了，中国的飞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是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重大事件之一。

正因如此，中国的兴起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越来越成为战略家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影响力的增大，中国是否会在世界上造成大的混乱和冲突？尤其鉴于美国负有帮助维护世界秩序的使命，它是否会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同中国合作，以便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将中国和平地纳入国际社会？

本章和后面的八章将探讨这两个问题。它们将通过八个国际“体制”来探讨中国的行为特点。所谓“体制”，就是能在这八个领域中维持某种秩序的非正式协议、制度、规范和惯例。后面八章将研究中国参与如下领域的情况：联合国、军控与裁军、人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电信、能源和环境。它们既考察成果也探讨不成功之处，既评判成绩又指出尚需努力的地方。它们有助于为制定连贯、一致、现实的中国政策提供依据。

本章首先将简要回顾中国 70 年代初极端孤立的处境。这将更好地说明自那时起它所取得的显著进展。接下来，将梳理美国国内时下的对华政策讨论。之所以有这种讨论，是因为美国对自己的实力、弱点及对冷战后世界的看法自相矛盾。随后，本章将

概述八个个案分析的研究成果。它们表明，中国在这八个体制中的行为特点迥异。它抵制某些体制，却同另外一些合作；积极参与某些体制，而在另外一些中则偏于缄默。接下来，本章将找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它们包括中国领导人的目标、体制本身的性质、中国的国内政治以及根深蒂固的战略战术。最后，本引论将探寻这些研究结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意义。

对中国孤立局面的回顾

25 年前，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动荡之中的时候，人民生活在恐惧与贫困之中，其程度之甚不为外界所知。千百万人在政治上受到威胁与迫害。政治犯在劳改营中饱受折磨，而他们是誰，外界也不得而知。

整个国家被排除在世界事务之外。它的领导人丑化国际军控协议和国际经济体系。虽然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实现了对华访问，中国政府的宣传仍然对美国 and 苏联大肆攻击。中国刚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边境形势紧张。在印度支那，中国正忙于援助北越、红色高棉和老挝的共产党。而当时，美国在该地区则陷入了旨在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越南战争。中美交恶使得整个地区形势紧张。

虽然受到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成功地获得了原先由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所占据的中国席位。但北京政府还没有成为联合国主要组织的成员。外贸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美国的贸易禁运也刚刚解除。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屈指可数。这种孤立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其领导人鼓吹极端自力更生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在美国的胁迫下，发达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孤立遏制的结果。

不可否认，该政权同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革命政党以及脱离苏联控制的少数马列政党保持着联系，还同大部分亚非发展中国家有外交关系。它同一些邻国结盟或者保持着较好关系，尤其是同朝鲜、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西方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不太成功，它的确能抠到一些高科技或禁运设备。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确实同在大陆的亲人秘密保持着联系。

但是这些联系微不足道。从根本上讲，中国处在孤立和受遏制的境地。很难想像一代人之前中国竟然离世界那么遥远。很多人都要通过香港进出中国。广东和北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直通车”。人们一大早就开始艰难的旅程，从九龙半岛南端毗邻天星渡轮码头的火车站出发，然后到达香港—中国边界线。下车后，旅行者就托着行李，跨过深圳河上的罗湖桥，向北行进。那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村庄、水牛和稻田。时至今日，这地方已是楼房林立、拥有 200 万人的深圳经济特区了。旅行者办理完中国的护照手续，在中国的火车站吃过午饭以后，就坐上一辆慢车开往广州。到站后，他们再乘坐黑色的红旗轿车或上海轿车（中国人模仿 1974 年的普利茅斯牌轿车制造的），疾驰过自行车泛滥的广州街头。那时，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四处可见，喇叭声震耳欲聋。只有到了沉闷的机场后才能把那喧嚣抛在后面。傍晚前旅客将从这里乘机飞往北京。乘坐苏制涡轮螺旋桨式飞机或任何型号的三叉戟式飞机能安全到达北京，人们就谢天谢地了。别忘了，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就是乘坐三叉戟式飞机而神秘丧生的。

70 年代初期，北京同亚洲其他主要城市之间没有直航班机。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包括许多省会城市，都不准外国人去。来中国的外国人如此之少，以至于外国政府每月都可以制定一个名单，列出所有去中国访问的代表团和个人，以及所有到海外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当时北京只有 5 家饭店接待外国人，但它们通常是空荡荡的。这五家饭店是：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民族饭店、

友谊宾馆和仅向海外华人开放的华侨饭店。那时北京饭店西半部还没有建设。在中国弄不到任何外国出版物，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广播也受到干扰。外国旅行者了解国外事件的惟一途径，是新华社编辑和散发的《国外新闻》，每日一期，还是油印的。同国外联系的电讯设备极少，即便有也是间接的。中国当时的长途电话服务也极不可靠。外国商人很少能到北京，大多数只能参加每年两次的广交会。如果他们真的能到北京的话，发电报也只能去中国电报大楼。后来过了很久，他们才可以使用电来进行通讯联系。

至少对美国人来讲，那时的 8 亿中国人如同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即便是他们的领导人，也为自己的宣传所欺骗。

一代人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又重新拥抱世界了。如今，中国的影响力波及世界任何重大事件。普通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已大大拓宽。香港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已十分广泛。中国对外贸易额 1978 年为 210 亿美元，1986 年为 738 亿美元，而到 1997 年则增加到 3000 亿美元。截至 1997 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 1300 多亿美元，对外债务达 1200 多亿美元。中国从世界银行的借贷量最大。90 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同美国一样，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两个国家。它已经成为 50 多个国际政府组织的成员，并已加入了 1000 多个非政府组织。光纤通讯电缆将上海和日本以及世界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中国邮电部之间有 2000 多条连接美国和中国的通讯线路。如今，北京的直航班机可以到达北半球的许多城市：芝加哥、底特律、东京、赫尔辛基、莫斯科、华沙、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伦敦和东南亚主要国家的首都等。10 多万中国学者和研究生在西方和日本学习过或正在学习，数万人在国外经过长期和短期学习后，已返

回中国。由于电视、盗版录像带和 CD 的缘故，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乔丹、麦当娜和港台流行歌手都已尽人皆知。

中国之所以对外部世界开放，是因为其领导人和世界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孤立中国对中国本身、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代价太高，而且也十分危险。70 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同西方领导人，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等，虽然双方在各自国内都视对方为政敌，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虚弱分裂的中国会导致苏联入侵，并成为世界动荡的原因之一，而一个走现代化道路的稳定的中国却可以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

改变了的战略环境

领导人决定让中国参与世界事务以及中国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的 25 年中翻了两番还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 13 亿人口那么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如此迅猛全面，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中外经济学家都认为，虽然波动不可避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将快速增长，其理由包括如下几个根本因素：储蓄率高，民众具有创业精神且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科技得到普及推广，经济政策基本对路以及国际环境有利。但他们也警告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也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严重影响，亚洲经济危机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即便经济增长率低一些，用不了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其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额也将跻身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中国的领导人是

谁，不论政治制度性质如何，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抽出政府新增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扩充现代化军备。这种可能性已经开始让许多亚太国家的战略家和军方领导人深感忧虑。

中国的一些行为也越来越令人担忧：国防预算不断增长，动用军事演习来恐吓台湾，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提出了扩张性的领土要求，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尤其是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总是极不情愿地接受联合国的各种国际维和行动。正如后面各章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 25 年里参与国际事务的情况作很高的评价，但它对于许多国际问题的强硬态度，已引发了对其未来走向的高度关注。

在美国，天安门事件促成了由多种政治势力构成的反华联盟。他们对中国在如下方面的政策感到担忧：人权、强制堕胎、监狱劳动、童工、台湾、西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核武器扩散、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环境问题。他们认为，剥夺民众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领导人若不改弦易辙，就不能让他们参与国际事务。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反华联盟走到了一起。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压制自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可靠伙伴。

此外，一些战略家认为，苏联崩溃以后，中国对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战略意义已不复存在。阻止苏联扩张时中国是一个有用的伙伴。但苏联不存在了，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不是可资利用之物了，而有可能成为对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国利益的长期威胁。

最后，中国的国内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惊人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强大了许多，而且领导人也出现了代际更迭。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前一辈领导人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作为革命领导人取得了很大成就，因而十分自信。而他们的继任者至少在掌权的前期，好像很受约束，宏谋大略少，寻求历史性和解的胆识与魄力差。不像毛泽东能够向美国敞开大门，或像

邓小平敢于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法来收回香港。在诸如台湾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问题上，他们好像没有能力作出必要的妥协，以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但是，他们 1997 年成功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在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方案，1997—1998 年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好转。这也许表明，他们将来处理棘手问题时能力会更强一些。

梳理美国对华政策辩论

出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就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现在，许多战略家不再担心一个国力虚弱和不稳定的中国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他们贬低帮助中国打破孤立局面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他们没有注意到，主要由于中国参与了地区事务，才使东亚地区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相反，由于中国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世界大国，他们现在开始担心由此可能带来的威胁，并着手考虑对策。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倾向于认为，过去 25 年中的记录与将来如何是不相关的。

这场辩论的特点是，国际事务理论贯穿始终。依据不同的理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不同。简单概括一下的话，这些不同的流派可以按两种方法来划分。依照第一种方法，可分为合作派和对抗派。合作派认为，在维护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最好能够承认中国的某些利益。这样，中国出于利害关系，就能够接受现状而不去打破它。对抗派认为，美国应当利用力量优势来迫使中国改弦易辙，适应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其将来再和中国争斗，不如现在就这样做。因为，美国现在仍有能力迫使中国做出最大让步，致使中国内部发生变化。合作派认为，可以防止中美关系

将来走上对抗道路。而对抗派则声称，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充满敌意，尤其是在同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关系上。

另外一种分法涉及有关国际关系的经典辩论，有三个流派。第一派认为，军事力量、国家实力仍是国际体系的基石；第二派认为，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影响国际事务的根本因素；第三派认为，观念的力量和它对思想的影响力，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这三种理论的追随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强调不同的方面。

表 1—1 有关中国的辩论和政策倾向

观察视角	主 张	
	合作派	对抗派
现实主义者	同中国合作，保持地区均势；支持中国加入各种武器控制体制	保护台湾；保持同日本和韩国的联盟；阻止中国出售导弹和核技术
经济至上论者	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鼓励世界银行向中国发放贷款；在环境方面进行合作	使用和威胁使用经济制裁；支持中国工人的权利
观念论者	同中国领导人长期保持高层对话；教育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促进中国国内机构的发展	将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要求中国给予宗教自由，支持自由亚洲电台

如此梳理对华政策的变化就出现了一个 2×3 的矩阵。它的 6 个部分分别对应着对华政策辩论中的 6 种观点：合作派现实主义者、对抗派现实主义者、合作派新自由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

者、合作派观念论者和对抗派观念论者。不可否认，这种划分方法过于简单化了。大多数分析家的主张既有合作派成分又有对抗派成分。他们认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观念的力量在当今世界都起作用。然而，他们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之处是，在三种力量中，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

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倾向认为，国际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基石，国家之间的力量必然是不相等的，有的强大有的弱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领导人能够理智地追求个人及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实力。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国，建立并维护一套为其利益服务的约定和规范；正在兴起的大国则不可避免地要寻求改变这些规定，以照顾其利益。在中美关系上，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重点是安全方面。

合作派现实主义者

合作派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正处在大国兴起的早期，现在还有时间来建造一个由中国参加的安全体制，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未来美中冲突。他们相信，如果将中国纳入全球和地区体系中，就可以利用中国的实力来抗衡其他可能变得强硬的亚洲国家。持这一观点的一些分析家主张，美国应当帮助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协调机制”。它可以像 19 世纪的欧洲那样，制定各方同意的规范和解决争端的机制。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在亚洲建立这样一个多边安全体制障碍太多。他们主张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大国发展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这种经典的均势安排不禁让人想起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这一流派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多边努力和双边努力应双管齐下。对这些现实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现在把中国称作敌人还为时过早。

对抗派现实主义者

对抗派现实主义者认为，中美关系将来会充满敌意，气氛紧张，美国必须现在着手做准备。他们指出，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利益分歧，并强调中国正决心倾财力和科技之所能来尽快扩充军事力量。他们的证据如下：中国向俄罗斯购买武器和军事技术；为了提高向周边地区发动高科技、有限战争的能力，制定了以此为重点的战略指导思想。他们把中国的兴起同前苏联的兴起相提并论，主张美国在亚洲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密切同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盟关系，阻止中美之间也发生冷战。他们谴责并试图抵制中国对韩国和台湾的政策，以及对外出售导弹及核技术的做法。

经济至上论者

另外一些分析家则认为，经济因素最重要，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是军事力量至上，而今贸易、国际金融和经济竞争力日趋重要。不仅如此，当今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民族国家正在失去原有的自主性和权力，它们的领导人越来越无力控制民众、观念和资金的跨国境流动。各国政府作为国际事务组织者的地位较先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公司、金融市场、国际组织，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的世界贸易组织），能对各国政府施加相当压力的国际非政府社团和群体（例如，环境保护主义者、人权组织、妇女权利组织或者宗教），还有国际贩毒集团、犯罪组织和存心颠覆国际秩序的恐怖主义分子。然而，经济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上也有严重的分歧。一方是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支持并希望促成一种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还有力量优势的时候，应悉心营造一个新世界（秩序）来保护美国利益。

新自由主义者

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贸易障碍最少，有助于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这种贸易开放性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将在世界上促进自由化和民主价值观的传播。不仅如此，由于电信和交通革命的原因，创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的可能性更大，对外贸易也远比先前容易进行。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兴起同先前一些大国的兴起有所不同，它所处的国际环境截然不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在适逢将中国纳入各种国际体制的绝好机会。中国加入后将减少它在行为上的随意性。随着相互依存度日渐加深，他们的战略是鼓励中国在外部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开放。这样，同外界有联系的国内势力就能够影响政府的所作所为。因此，要鼓励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贸易体制，并对它作出一定让步。这样的话，中国领导人才会更加积极地支持现有国际贸易体制。因此，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同样重要的还有，应使中国允许外商进行直接投资，协助中国开发资本市场，让中国的服务行业向外国开放。新自由主义者还强调，在解决诸如环境恶化、贩毒、非法移民等由于国际相互依存而加剧的问题上，同中国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新自由主义者也都认识到，同中国建立这些关系非一朝一夕之功，出现反复倒退也是可能的。但他们愿意多一些耐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政策的好处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完全看出来，而要等数年之后才行。另外，他们大都认识到，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努力有可能失败。因此，虽然他们对中国积极参与的愿望表示欢迎，但也强调中国加入的条件必须能够保护世贸组织的宗旨。而美国对失败也必须有所准备，尤其要同亚洲的伙伴保持良好的双边联盟关系，在该地区保持一支有足够威慑力的前沿驻军。

经济民族主义者

经济民族主义者也主张经济实力是当今国际事务的关键，贸易问题是一个国家应当首要考虑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相互依存本身会自然而然地有利于美国，或者美国能够过多地依靠多边论坛保护其利益。这些人有时被误称作孤立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最重视贸易的重要性。他们并非在宣扬经济自给自足。他们只是认为，贸易条款应当由美国政府仔细确定；美国的经济实力十分强大，它可以通过对抗、强硬的谈判和使用制裁迫使别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他们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市场。他们担心，如果美国现在不利用经济实力迫使中国改变贸易政策，那么中国将走上新重商主义道路，并成为第二个日本。因此，他们强调，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美国应当仔细提出条件，很好地保护其国家利益；美国必须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直至中国在诸如保护知识产权和中国工人权益等方面满足美国的要求；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对美贸易顺差，美国应当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观念论者

除了将军事作为国际事务的关键的现实主义论者和推崇经济因素的新自由主义者和经济民族主义者，还有第三类分析家，他们强调观念的力量以及人们可以学习和接受新观念的能力。对于这些分析家来说，国际事务并不是仅由一套主观的经济和安全考虑来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各国领导人和公众如何看待国际事务。在他们看来，关键是文化、意识形态和知识。他们认为，美国有机会改变中国对当今重大事件的看法。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但是，观念论者的分歧在于，美国到底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吸引哪一部分人。

合作派观念论者

一些人认为，关键目标是中国领导人和战略思想家，即中国的精英。所传递的信息应强调冷战后世界的性质。合作派观念论者寻求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战略对话，就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所面临的重大威胁达成共识，以及在影响世界事务发展的关键趋势上形成共同看法。他们主张就双方的根本价值观念、利益和战略目标进行广泛而坦诚的讨论。这些讨论要花很多时间，需要耐心。他们希望讨论能达成深刻的共识，在两国价值观念和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最佳合作，在不一致之处最好是控制分歧。只有通过这种对话，双方才能相互信任，双方领导人才能下定决心，绕开难以对付的官僚机构，解决两国间的棘手分歧。

持这种观点的人从以下的事件中得到了启发，即 70 年代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他们的主要顾问之间所进行的对话。对话内容的知情者认为，它们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早期的进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 1989 至 1996 年间中断了这种对话，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但进行这种对话就意味着尊重中国领导人，能够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作出妥协和让步。在 1997 年 11 月和 1998 年 6 月的中美峰会上，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进行了很好的公开辩论。这表明两位领导人继承了对话传统，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讨论的范围涉及到了人权并且是公开进行的。中国经济官员同世行官员和西方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广泛对话也同等重要。正如本书第五章所指出的，这些对话为中国的经济思想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添加了新的词汇。而这些观念和词汇又促进了中国国内机构的发展。新的机构又导致了深刻的文化变化，而文化方面的变化将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一言以蔽之，对话能改变人们的战略思想，促进新的国内机构的发展。

对抗派观念论者

另外一些认为观念起决定作用的人，则蔑视将重点放在精英阶层的做法。他们认为，为了推行民主价值观，目标应当放在广大中国公众身上。他们各有各的说法。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民主、人权的支持者在中国大有人在。他们希望向这些中国人提供必要的信息，使他们能够维持信仰，继续活动。另外一些人则怀疑是否有那么多人认同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希望在中国人身上培养这种感情。对抗派观念论者支持自由亚洲电台、民间外交、流亡在外以及仍在（中国）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推荐的政策是，与中国领导人对抗，指出他们意识形态中的弊陋之处，要求其进行民主化。他们相信，这种做法在东欧剧变中起了作用，制订对华政策时应注意这方面的经验。

辩论的政治

实际上，合作派与对抗派之间的辩论以及现实主义者、经济至上论者和观念论者之间的辩论早就存在。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 1972 年尼克松向中国敞开大门以来，辩论就从未间断过。那时，对抗派现实主义论者警告要小心中国的崛起，而合作派现实主义者则强调同中国合作对付苏联。有些人对于中国支持（它国）游击战争和发展核武器表示应当有所警惕，而另一些人则强调毛泽东的做法带来了机遇。有些人认为，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注定要毁掉该组织。他们预言，中国的破坏性行为将使联合国处于瘫痪状态。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对话与参与能够促使中国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变化。

在美国政府内部，相互合作、全面接触论的最强有力支持者在行政部门；而对抗派的最坚定支持者在国会。因而，现实主义者在五角大楼中居主导；经济至上论者在财政部、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一统天下；国务院则更看重在它的支持下进

对话。政策偏好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机构宗旨的不同。

但从 1972 年到 1989 年，这种辩论并不激烈。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的政治成功，使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广泛共识，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仍有不同声音，如在堕胎、台湾、技术转移及贸易赤字等方面。但自 1989 年 6 月 4 日以来打破了这个共识，使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很难令政府机构之间及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在政策上保持一致。自 1989 年以来，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加强了同某些国会议员、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盟。虽然这种联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很常见，但中国官员却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难以置信的是，对华政策竟是些不相连贯的决定，白宫只偶尔做些协调。他们很难相信外交政策竟是这样混乱地制定和执行的。美国自 1989 年以来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上述 6 种政策偏好的大杂烩。

1972 年以来中国的国际行为表现

迥然不同的部门看法、狭隘的特殊利益以及抽象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不能为一个可行连贯的对华政策提供坚实的依据。相反，对华政策必须以过去 25 年的历史为依据。那么，将中国融入各种国际体制的努力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八个个案分析。

第二章中，塞缪尔·金研究了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情况。结果表明，过去 25 年里，中国已经从体制改造者逐步变成了体制维护者。金对于中国意在破坏现状的说法直接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北京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联合国，最好地服务于它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参与联合国倡导的条约及活动的范围大大拓宽，^①并为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变动作出了贡献，如在军控、维

和行动、北南关系、人权、科技和环境保护方面。金同时还指出，中国参与联合国时仍遵循这样一种看法，即世界是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它以国家的主权、平等、责任和权利为基础”。中国还遵循一条最大或最小的现实政治政策，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但承担最小的经济责任。不管怎么讲，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国际行为特点从整体上看，是逐渐从对抗转向合作。

第三章中，迈克尔·斯温和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军控体制的情况。他们指出，对主权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参与国际安全体制。他们评论到，“由于国际军控日益具有干涉性，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行为表明，它力图避免将其军事力量拿到谈判桌上，并刻意保持和提高它的相对军事力量”。北京不愿接受安全合作的想法，也不愿意承认有必要对它的军事能力真正加以限制。北京仅支持不需要它做什么但却能够提高其形象的做法。同时，斯温和约翰斯顿也感觉到过去10—15年中，中国在这方面的看法已有所改变。它原先以为，军控与自己毫不相关，如今则认识到，更多地参与国际军控体制是有益的。中国如今参加了一系列限制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协议，它们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公约》。它还积极全面地参与了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对话，比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委员会。斯温和约翰斯顿还确认，中国国内正形成一个军控专家群，他们同西方的军控专家保持着广泛联系并且支持安全合作。但二人同时还指出，该专家群在中国制定军控的决策中影响力甚小。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军控谈判，使它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更有效地实现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目标，却未能促使它重新考虑如何能更好地获得安全。

第四章中，安德鲁·内森认为，国际人权组织和别国政府，